

华文文学是时间/空间、社会/历史、民族/国家、东方/西方等多元文化交融互渗的混合体,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汇,其中涉及身份、归属、族裔、阶层、文化认同等多层次的复杂问题,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跨界融合的世界性文化形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烛照华文文学,许多研究的困厄与争辩、难题与迷局豁然间迎刃而解。

华文文学概念的再界定

华文文学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所有以华文(汉语为主)创作的文学;狭义则仅指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学界研究均取其狭义用之,本文所言华文文学,亦指其狭义。

华文文学的发展百年有余,对华文文学的研究也已四十余载。1979年,因《花城》创刊号刊登的曾敏之《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一文,和《当代》文学杂志刊登的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引发了中国大陆学界对“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的研究。1986年,第三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因大量海外学者的加盟,更名为“全国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1991年第五届会议因澳门学者的加入,更名为“台湾香港澳门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993年第六届会议,与会学者一致认可将会议更名为“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可见,华文文学的研究发轫于中国台港澳文学,并逐渐扩展至中国本土以外的世界性的华文书写热潮;华文文学不仅具有“中华性”“民族性”,更具有“在地性”“世界性”。目前对华文文学的研究,不仅包括华文文学的文学创作,还包括华文文学社团、文学批评、文学交流、文化传播等内容,形成了全球性的华文文学研究盛况。

因创作主体身份的多重性、移居地域的流动性、书写文字的杂糅性等原因,华文文学的发展一直处于持续、开放、交融的动态进程,这使得华文文学概念的內涵与外延始终处于变动之中,由此亦引发了华文文学研究范畴的持续论辩。大致而言,论争基本集中在“华人”“华语”两个焦点。以种族/族裔/民族定位的“华人文学”,过于局限作者的族群身份,不仅将众多非华裔作者以汉语书写的作品排除在外,而且对于众多具有华人移民代际身份的作者而言,亦很难认同祖辈“华人”身份在自身的顺延,比如东南亚诸多华文作者的情况就是如此。至于以语言文字为定位的“华语文学”,最初限定的是“汉语”创作的文学,很自然不符拥有56个民族的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书写情况;其次,对移民的华人作者而言,他们运用非华语创作的大量作品,同样无法纳入华文文学研究的范畴,这种情况大量见于中国大陆及台港澳移民世界各地的作者;其三,即便对于台港澳地区,同样存在大量非华语创作的华文文学作品,如澳门土生文学(多以葡萄牙语写作)便是如此。

可见,无论是“华人”还是“华语”,均难以界定复杂多元、流动交融的华文文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众多研究者开始思索华文文学的文化内核也即“文化的华文文学”的特质。基于此,本文尝试对“华文文学”之“华文”重新界定,提出“文学”与“文化”双重涵义的“华文”之“文”。言下之意,华文文学的创作主体与国籍/族裔/身份等无关,只要满足“语种”(华语)和“文化”(中华文化)两个条件中的任意一个,即视为华文文学。譬如韩国许世旭、澳大利亚白杰明和美国谭恩美的华语文学创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华文文学研究

□艾尤 阮南燕

作,美国哈金、汤婷婷等人的英语文学创作,再譬如澳门土生作家李安乐、费雷拉、马若龙、江道莲、飞历奇、飞文基等以葡语创作的表现中华文化的文学作品等等。这种界定,扬弃了之前从语种、地域、族裔、身份等因素对华人创作者的机械分类,将华文文学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大视域之中,从学理的角度探讨以“华语”和“中华文化”为支撑的华文文学,在主旨呈现、情感表达、价值取向、审美意蕴、语言习惯以及思维范式等各方面,所呈现的文化的多元性、思想的交融性、审美的驳杂性等“同中有异”“和而不同”的思想文化特质和文学风貌,以及借由文学创作所形成的华文文学共同体的世界画卷。

文化主体和文化间性

共同体概念在西方由来已久,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卢梭、滕尼斯等,共同体理论在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建树颇丰。马克斯则将其共产主义社会称作“真正的共同体”。20世纪以来,共同体概念的使用更加广泛,如麦基弗“社区共同体”,吉登斯“脱域共同体”,米切尔·波兰尼的“科学共同体”,温格的“实践共同体”,约翰·拉吉的“知识共同体”等等。安东尼·科恩在《社区的象征性结构》中指出,共同体是一种象征性结构,核心是对意义和身份的关注;杰拉德·德兰提的《共同体》则进一步指出,共同体既不是一种社会融合的形式,也不是一种意义形式,而是一种关于归属的开放式的交往系统。

回顾人类发展的历程,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到黑格尔“绝对理念”所开启的理性至上的现代性追求,人的主观性、能动性、本真性愈益式微,人类社会的发展愈来愈陷入主体/客体、理性/感性、精神/物质、思维/存在等矛盾冲突的二元对立模式,引发了深沉的生存危机、伦理危机、价值危机等现代性危机。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是后现代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进程的加剧,现代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缺乏安全感、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人、社会、国家(地区)成为

彼此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利益与风险同在的“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剧烈变化的国际格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生,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概念,深入分析中国以及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矛盾挑战,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安全等不同层面,追求全方位、多层次的人类共存,为实现全世界“真正的共同体”提出了“和而不同”的中国方案。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的是国际间独立主体的对话,即主体与主体的平等对话模式,其间可见哈贝马斯主体间性理论向文化领域延伸的文化间性理论的影子。文化间性以文化主体之间的对话为前提,注重文化的差异性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关系,强调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独立性的坚守和认同,并通过与他者文化的交融、交互、交涉达到文化之间的共存、共生、共荣。无疑,正是在文化主体性与文化间性的研究视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华文文学内质形成了某种精神层面的共振。

整体而言,在华文文学的百年发展进程中,大致呈现出中国台湾、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东北亚、北美、欧洲、大洋洲等几个核心区域的华文文学主体。受历史文化、移居生态、语言民俗、媒介传播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各区域华文文学的“中华性”“在地性”和“世界性”各不相同,彼此独立又彼此互渗,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主体。如果说早期的华文文学研究侧重于“政治中国性”或者民族国家意识的解读,以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为阐释和研究基点;那么,随着“世界华文文学”视域的开启,华文文学研究则开始尝试以“中国性”对全球的华文文学进行整合研究,如刘登翰、周宁、饶芃子、陈辽、黄万华等提出的“分流与整合”“一体化”“美学中国”等研究思路。然而,这种基于“中国性”的整合研究,难免带有中心/边缘、主体/客体、主流/枝蔓等立场,忽略了各区域华文文学之间的互动、互渗、互融的“在地性”与“世界性”,也忽视了不同文化的传承/冲突、变迁/创新、

同构/延异等更为丰富的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和复杂性。马华学者如张锦忠、林春美、黄锦树等提出了建构马华文学的主体性;北美学者史书美、王德威等提出“华语语系”的概念。这种破除国界/地域对华文文学在地性/世界性/主体性的关注,以及对文化间性的理性诉求,很自然让学界继续寻找更为契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刘俊和刘小新等学者纷纷提出“跨区域华文文学”等研究思路,强调关注华文文学各区域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与此同时,同样强调文化主体性和文化间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开始进入华文文学研究视野。

一种研究新视域

从华文文学书写的整体发展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各区域的华文文学生态依旧复杂多元,但其文学书写则悄然呈现出某些新变:普遍从对无根愁绪、怀旧情结、漂泊心态、离散意识、文化冲突、身份焦虑等华文文学传统母题的书写,转向更为多元、开放的对全球化语境下主体的日常生活经验/生存困境、人性异化/精神归属、现代性危机/人类共同命运等话题的思考,呈现出普遍的对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以及情感、伦理、审美等多层面的文学书写转型。相应的,在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有学者也开始审视华文文学书写的共同体意识。如张福贵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对华文文学“人类意识”与文化自信的阐述,杨匡汉、刘俊等指出不同区域的华文文学已经形成了“世界性华文文学共同体”,朱双一认为“书同文”使全球华人形成了“文化共同体”,古远清认为需要以华文文学意识的多维视野来探讨华文文学共同体,从而构筑一个具有国际性、整体性的世界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此外,如王德威对“华文文学想象共同体”的阐述,赵稀方对“中国文学共同体”的强调等等,不一而足。上述具有共同体意识的华文文学研究,虽提出了相关的“共同体”概念,但论述重点在于华文文学的特质,鲜有对“华文文学共同体”概念进行界定,更遑论深入阐述华文文学共同的情感命运书写与文化传播所形成的具有主体性的文学

共同体的深沉内涵,故本文尝试提出“华文文学共同体”这一全新的研究视域。

“华文文学共同体”具有持续发展变化的、未完成的、流动的开放式结构,以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互、交融、交汇的对话关系为基础,强调华文文学的主体性、差异性、同一性、对话性,是一种具有文化间性的、可凝聚世界文化力量的文化共同体。

“华文文学共同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以“文学”和“文化”的华文文学为核心。从纵向维度看,“华文文学共同体”包含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华文文学所形成的样态各异的文学共同体。比如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和新加坡华文文学,二者虽同属东南亚,但由于所处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历史文化习俗等各不相同,由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马华文学共同体”和“新华文学共同体”;但相似的地缘性和文化呈现等,又让二者成为东南亚华文文学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横向维度看,“华文文学共同体”又包含“情感共同体”“族群共同体”“性别共同体”“伦理共同体”“空间共同体”等等共同体形态。这些华文文学共同体随时空变化而呈现历时性与共时性交叠的多维动态图景:或独放异彩,或交叉重叠;或矛盾对立,或交融共生;既具有各自独立的文化主体性,又具有开放的文化间性。而无论何种维度或者类别的共同体,无论文本、文化或理论的样态如何多元,连接各共同体的始终是人类对自由、美好、幸福的憧憬,对苦难、困境、厄运的抗争,对人性善恶、种族歧视和人类命运的审视,对人道、和平、爱和两性平等的呼唤。其实,如果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角度回顾华文文学的书写历程,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可以贯穿百年华文文学的书写之中:或隐于去国怀乡的离散漂泊、异国他乡的爱恨情仇;或显于对人性卑劣、社会动荡、生态恶化、人类命运多舛的理性批判;或藏于生活琐事、生存经验、人生哲理的描述;或见于对文化冲突、价值相左、伦理悖谬的审视。正可谓爱恨情仇、思欢怒恨,感于幽微、流乎啸歌,一往而尽、积日不休,绵延百年,美美与共。

“华文文学共同体”研究范式的建构,尝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打通华文文学与大陆文学、世界文学的研究壁垒,改变以往区块划分的单向度的专题研究模式,将全球华文文学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以和合思维模式建构与世界平等对话的文学研究自主性理论体系,走出华文文学研究被西方理论裹挟的现状。也就是说,“华文文学共同体”的研究范式强调建构开放性的对话系统,基于华文文学的主体性与同一性,以文学生态/文化基因/民族精神等因子为基点,寻求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对全人类情感和命运的共同映照;立足华文文学的差异性与文化间性,探寻区域文化之间交互式的文化交流、文化空间和文化融合,以及由此形成的世界性的文化潮流;整合文学创作/文艺批评/文化传播/理论研究,思索华文文学共同体各组成部分因价值思维、伦理精神、文学传承以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缘由所形成的多元多维、共融共生、和而不同的文学空间和文化融合,强调“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世界文学场域中的主体性与独特性,探究中华文化向心力与世界文化开放性之间的文化张力。

路漫漫其修远,华文文学书写正蓬勃,华文文学研究将再起航。

对德国华文女作家刘瑛来说,文学是一种不懈的精神追求,也是展示艺术才情的大好用武之地。最近,她连续推出的短篇小说《空格》(载《香港文学》2021年第11期)和《第三位幸运者》(载《中国作家》2021年第12期),相信给读者带来了不少惊喜。这两篇小说的一个重要共同特点,是以德国华人女性生存为背景,描述当下华人女性在西方发达国家别样的生活故事,探秘她们鲜为人知的内心历程,或追踪她们惊心动魄的生活历险,堪称新奇别致的华人女性叙事,在带给读者思想启迪的同时,带给读者别样的审美体验。

《空格》勾画了一位华人中年知识女性的独特心路历程,并在中西方文化比较视域下,楔入了对现代女性生活道路与人生价值等女性命题的深度思考,无论小说题名还是书写、思考女性生活的角度都让读者为之耳目一新。对小说中的这位华人女性来说,“空格”虽是人到中年之后生活的一个暂时的停顿、歇息、独处,但更是转换生活方式、通向未来新生活的一种宝贵契机,可谓带有某种里程碑式的人生“节点”,在她的人生道路上具有重要开创性意义。“空格”以前,她的生活主要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作为现代女性在国内的成长。那时,她是全省文科高考状元,是家长们赞不绝口的“别人家的孩子”,还是在首都上大学、主修英语、兼修法语的高才生,满怀毕业后到欧美深造的远大理想。第二个阶段是在德国二十年如一日回归家庭妇女。在跟随理工科出身的丈夫妻子定居德国之后,由于生活的裹挟,她陡然间不自觉地走上了相夫教子的生活道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嘉许的贤妻良母。近二十年中,喂养儿子、女儿,接送他们上学,照顾丈夫的生活起居等等,成天忙碌,成为她生活的主旋律,似乎也成为了她人生价值的全部体现。此时际,儿子、女儿都上了离家较远的大,丈夫也去法国出差,生活的“空格”终于不期而至。或者说,她终于可以不听丈夫、儿子、女儿形影不离的使唤,一个人安心地躺在床上睡懒觉了。也正是这个难得或期待已久的“空格”使她获得了反思过去、检视人生的机会,开始筹划新的生活。固然,对二十年来对家人做出的奉献和牺牲,她是乐意的,她体现出她作为妻子与母亲的伟大——从另一角度说,她的这种奉献和牺牲甚至充满了必然性,是她为一家人在德国生活、发展或落地生根所必须承担的责任。然而,她毕竟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在西方文化耳濡目染下的现代知识女性。虽然家庭需要让她长时间回到了家庭妇女身份,但从现代女性回到传统女性的“憋屈”与“委屈”,或身份错位形成的隐形心理落差,从来都无法真正消除,作为现



新奇别致的华人女性叙事

——评刘瑛《空格》和《第三位幸运者》

□吴道毅

代女性的人生梦想虽然“蛰伏”已久却从未窒息。何况,那些如今在职场上混得风生水起的往日同学,常常是她羡慕的榜样。一句话,她作为现代女性的生命意识,在“空格”时段里,或者说在一人独处的间歇中,悄然生长,且生机盎然。于是,她尝试找回自己消泯已久的个性,比如像裸睡这样带有某种私密意味的生活习惯;她翻看起以前的老照片,重温生活的美好与欢乐;她更意识到“脱离固有一切”——即打破长期固化的生活模式,率性而为,去放松自己,去自主、自由地寻求生活的快乐,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怕多少有一些冒险——比如,像孝顺儿子建议的那样,说走就走,只身去中美洲国家格林纳达去旅游、摄影。况且,丈夫的事业有成、功名成就,儿女的长大成人等等,为她创造了新的生活空间。对她来说,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是重塑自我、找回自我的崭新过程——虽然这一过程未必是事业或职场上的铸造辉煌。正因为如此,“空格”是过去生活时段的一个终点,也是她走向新生活或再次回归现代女性的起点。在德国或欧洲华人女性中,她这样的人并非个案,而应当是一个具有典型性的较为庞大的群体。刘瑛对她的形象塑造或心理刻画,实属难能可贵的艺术发现。

《第三位幸运者》展示的是一位华人女性在德国的人生历险,重点凸显了复杂生存环境给华人女性命运提出的严峻挑战,也在很大程度上审视了德国社会体制与文化观念存在的某些流弊。作品主人公是一位坚强、勇敢的华人女性,但在与德国男性的交往中险遭杀身之祸。这种历险的背后,暗藏着生活的玄机,偶然中包含着必然。对她来说,因为家中患有瘫痪的丈夫与生哮喘病的儿子,生活的重压促使外表柔弱的她在生活道路上勇往直前,无所畏惧。因此,尽管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

语言交流不畅,有幸来到德国一所专科学院深造的她除了参加德国强化班学习之外,必须打工挣钱,养活全家,乃至把自己豁出去,无法顾及困难、劳累与危险。也正是为了挣得比一般性工作收入丰厚数倍的钱,她由语言班同学塔莎介绍,走上了夜晚去德国老嫖夫施罗德家中陪他聊天的工作之路。如果不是儿子在她的手机上安装了定位软件以及施罗德看到了她手机上的路线图,她一定会像陪施罗德聊天的前两位外籍女性一样,被施罗德设计杀害,不会成为小说题名所说的“第三位幸运者”。就施罗德而言,他正人君子与杀人魔王的双重面孔让人感到扑朔迷离与难以理喻。一方面,他是技术精湛与敬业爱岗的汽车机械师,是热心于当地公益事业的志愿者——甚至按照妻子的遗愿,捐出妻子眼角膜救助土耳其的一位年轻人,是让人尊敬的恩人。另一方面,他有着严重心理与生存困境,乃至导致心灵扭曲。一是小时候他父亲背叛母亲,把妓女招进家中给他留下了一生都挥之不去的创伤记忆,把对父亲的恨转变为对妓女的恨。二是年老体衰,妻子故去,独女住在外地,他不但孤独、寂寞,而且失去对生活的理性判断力,沦为杀人恶魔,一再把从网上花钱雇来陪他聊天解闷的女性当做妓女进行报复,阴谋杀害,藏匿家中。对幸免于难的华人女性来说,她的幸运自然来自儿子时时刻刻对她的关心。这种关心自然也是儿子对母亲养育之恩的回报。因此,作为华人家庭,是亲情暗中帮助她化解了这场致命的灾难。

在两篇小说的叙述中,刘瑛一如既往地加入了她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审视与对人类共同命运的观照,由此有效地拓展了小说思维空间。《空格》关于儿子两段成长经历的回顾,叙述上看似“闲笔”,却很好地扩张了小说叙事空间,营造了小说人物活动的文化与生活氛围。儿子高一时期与戈比等同学写抗议信,结果受到处分。在德国文化中,写抗议信无可厚非,却不能侮辱他人的人格,因为“尊重他人,是文明社会每个成员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至于儿子5岁时对死亡的发问,隐含的是作家超越民族与种族,对生老病死等人类普遍生存困境的观察与思考。《第三位幸运者》在审视德国老年人问题的同时,更是广泛观照了德国的移民制度、从业制度与福利制度等,凸显出这些制度的利与弊。从小说叙述

中看出,德国从人道主义出发,接受了来自周边及印度、巴基斯坦等欠发达国家的大量移民。德国的公交车等对残疾人照顾备至,对包括外籍已婚妇女在内的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保护极好,堪称世界典范,但即使是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德国,也未必是从从业者的天堂,它的社会福利制度也会让塔莎那样的女性觉得有金子可钻,德国的治安秩序整体较好却暗藏着施罗德那样的毒瘤。

叙述与构思的新颖是两篇小说的共同艺术特点。在《空格》中,“空格”被设置为一种叙事枢纽,女主人公生活的过去与未来,她作为现代知识女性与传统家庭妇女两种身份的心理切换,都在“空格”中得到巧妙衔接或展演,显得从容不迫而游刃有余。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与儿子、女儿的视频通话等,被放在“空格”时段内,用现在进行时或顺叙加以叙述,她以前的两段人生经历等,则置入她的回忆中,用过去时或倒叙加以叙述,二者各就其位,连接天衣无缝。《第三位幸运者》人物、事件较多,有着悬疑小说的色彩,设置正、副两条线索,注意截取生活横断面,采取时空跳跃方式,在构思、结构上做足文章。具体便是把华人女性的人生历险设为主线,把施罗德的包藏祸心设为副线,对他们各自的生活片段进行有效裁剪与拼贴、嫁接,尤其是把他们各自的往事巧妙地放在他们“聊天”中自然“流出”,看似寻常,却颇具匠心,不露人工雕琢之迹。



樊哲摄影作品